

漢詩「下南洋」： 馬華漢詩的風土與疆界

一、境外：漢詩的離散與南來

十九世紀末以降，士大夫與平民百姓的跨境出國已成常態，尤其以謀生為主的群體遷徙，華工的跨境出洋，說明晚清以來的中國正進入大離散的時代氛圍。在此脈絡下重新討論詩的寫作，除了凸顯詩的境外書寫已成為遷徙者在流動過程中極為重要的文學實踐，同時亦清晰勾勒出中國精粹的傳統文學形式，必然遭遇海外異質世界與文明體驗，從而衍生文類形式的守成與改造，以及修辭手段與內容表徵的思考。如此一個遷徙流動的情境，一個主動與被迫的現代境遇，無形中預告了傳統文人最熟悉的古典詩詞寫作，進入到一個現代情境世界的書寫。

我們以漢詩命名這類境外書寫的舊體詩歌，除了兼具域外漢字

2 馬華文學批評大系：高嘉謙

文化圈的古典詩詞寫作傳統，同時凸顯世紀交替的境外漢詩具有詩界革命倡導的「新意境、新語言、舊風格」的寫作趨向，多有音譯新詞新語入詩現象，漢詩更接近現代情境下的境外寫作與離散狀態——不在中國，既有漢語的文化想像，亦有漢語的表述邊界和語言混雜現象的實驗及思考。

從族裔遷徙和離散敘事的角度而言，「下南洋」或「南來」表現了中國南方在境外的經濟與勞力流動，並象徵一個值得探究的文化與文學播遷的地理軌跡。中國使節和文人的南來形塑了早期新馬地區的文學生產，其中以漢詩寫作規模最為可觀。這些知識份子的南來凸顯士大夫階層的境外離散和文化播遷，尤其部份南來文人兼具詩人和政治身份，他們流寓南洋期間的文化影響和文學實踐，都直接或間接形塑了我們理解殖民地時期新馬最初的文學風貌。從左秉隆、黃遵憲、楊雲史、康有為、丘逢甲、梁啟超、邱菽園、陳寶琛，甚至二戰時期的郁達夫等外交官和詩人的南來，我們注意到了南方的漢詩譜系精彩的一面。而報刊、文社的普及，由晚清延續到戰後，不曾中斷且散落報刊的無數漢詩和默默無聞的詩人，更說明了不容小覷的漢詩生產規模。漢詩形塑的海洋意象、中華帝國及其周邊國家的朝貢貿易歷史和世界體系的變革、離散華人社會的脈動、中華教化與文化傳播、認同與鄉愁、殖民地體驗，以及近代中國的地理、外交、政經延伸的家國危機，成為別具面貌的境外漢詩特色，理應構成辯證東亞漢詩體系的新視角。尤其漢詩的生產不但構成了華人移民文學的早期發展型態，且銘刻南來的遷徙情境和移民的落地生根。截至廿一世紀的今天，漢詩始終未絕跡於新馬地區，象徵了南

來脈絡的馬華文學生態中，持續性的對民族文化和審美意涵上文化共同體的想像。

南來文人對馬華文學別具意義，當然屬於離散文學的重要個案，間接也指出南來作為一個遷徙流動的地理概念，實際已是一個文學地理的觀察。馬華離散漢詩因而是討論馬華文學的起源與發展，最初且關鍵的文本。這提醒我們關注殖民地時期的馬來亞華人移民社會，及其文學生產機制，同時提出對馬華文學史書寫長期以新文學為起點的反思和辯證。

本文試圖描述南來象徵的文學播遷與跨境，以及馬華古典漢詩群體的組成脈絡，探討十九世紀末南來作者形成的文學社群和建制，以及他們筆下的南洋書寫。對照今日仍陷認同政治的馬華文學¹，漢詩既勾勒出別具意義的文學地理和離散敘事，也凸顯了馬華文學最初的越境，以及漢詩與現代性的辯證。

我們藉由詩人筆下理解他們表徵現代情境下瞬間震攝的存在感、時間的急迫和文化斷層的擠壓，一一浮現為詩的內容，以致地理的遷徙、流亡，變成詩寫入時代的重要姿態。因此漢詩的古典意象在越境寫作裡，難免構成抵擋現代時間風暴的隱喻式書寫，相對帶有一種文化的審美意味。

但漢詩的現代性思考，不僅是新派詩意義下的新詞彙、新概念，而是現代性意識如何具體落實在「滑動覆疊」的異元素變革與轉換。

¹ 對此議題的重要討論，參黃錦樹，〈馬華文學與（國家）民族主義：論馬華文學的創傷現代性〉，《中外文學》34卷8期（2006年1月），頁175-192。

因此漢詩在遷徙流動中的空間、疆界思索，以及對城鄉地景、自然景觀、文化空間和生存體驗的描述，具體辯證了詩人在南洋的存在方式與自我認知，因而形塑馬華的漢詩風土²。換言之，我們對漢詩「下南洋」的思考，不僅是設邊立界的國土疆域，尚且觸及語言系統的變換與人的生存位置與想像，呈現文體與疆界的交織和連繫。

二、「被發現的南洋華人」：使節與漢詩

一八八一年首位由中國直接派駐新加坡的領事左秉隆（1850-1924）走馬上任，同年新加坡最早的華文報刊《叻報》創刊。使節到來，中國文人南來旅遊、訪友活動逐漸頻繁，文人之間的詩詞唱和透過報刊等公共領域流傳，一個由南來文人與本地士紳共同組成的「士階層」初步形成。³流寓者投入漢詩寫作，表現了中國知識份子的傳統教養和文化雅興。其中，左秉隆創辦會賢社，每月在報刊開出課題，公布課榜，評選優異詩文，建立一套對華人移民啟蒙教化的文化機制。一八九一年接任領事的黃遵憲（1848-1905）將「會賢社」改為「圖南社」，眼光轉向南洋風土紀錄。每月課題中，關於南洋的題目就有「新加坡風俗優劣論」、「巫來由文字考」、「南方草木

² 討論「風土」的具體意義，是觀察「我們在風土中發現我們自身」。參見和辻哲郎，《風土》（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年）。

³ 相關研究見梁元生，〈十九世紀新加坡華人社會中「士」階層之分析〉，收入氏著，《新加坡華人社會史論》（新加坡：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1997年），頁9-30。

贊」、「新加坡草木雜詩」等。黃遵憲以「圖南」社名取自莊子大鵬南飛的典故⁴，期勉社員大興文風，開啟南國的文學天地。他超越一般流寓者的去國憂思，進一步以使節的高度，關懷華人社會的內部議題，將焦點放在華人社會的基本生存的大環境。

使節的派駐改變了南洋華人的政治環境，同時推動了當地的文化傳播與文學教化。二人不但是清廷派駐南洋頗受稱譽的領事官，且留下詩集。左秉隆《勤勉堂詩鈔》（1959）由後人結集，寫於新加坡詩篇約兩百至三百餘首，紀錄了前後兩次共十餘年駐新生涯的見聞。⁵他曾有詩句：「乘興不知行遠近，又看漁火照星洲」。為此小島賦予「星洲」雅名⁶，又以息力（selat）為題，特寫星洲開埠後作為

⁴ 〈圖南社序〉，《叻報》（1892年1月1日）。又見黃遵憲著，吳振清等編校，《黃遵憲集》（天津：天津人民，2003年），頁383-384。

⁵ 左秉隆駐新時間共有兩次，分別為一八八一至一八九一，一九〇七至一九一〇。《勤勉堂詩鈔》只進行體例分類，未做繫年，故對其寫於南洋的詩篇判斷也有出入。其中李慶年統計約三百一十八首，何奕愷統計則是二百四十一首。對照整本詩集的篇數，寫於南洋之作已佔四至五成。數量如此龐大，歷來討論者卻不多。關於李、何二人的統計，見李慶年，《馬來亞華人舊體詩演進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6月），頁96-98。何奕愷，〈左秉隆《勤勉堂詩鈔》中南洋之作考〉，《南洋學報》第63卷（2009年12月），頁131-146。左秉隆，《勤勉堂詩鈔》（新加坡：南洋歷史研究會，1959年）。相關詩作的引文均出自此版本。

⁶ 論者普遍以為「星洲」一詞始於邱菽園創設。見邱菽園，《五百石洞天揮麈》（卷一）（廣州：閩漳邱氏，1899年），頁24-25。他在晚年遺作〈星洲溯源談〉也提及這是在自己在一八九八年「為天南新報時所偶然命名」。此文收入蘇孝先編，《漳州十屬旅星同鄉錄》（新加坡：僑光，1948年），頁13。但陳育崧指出「星

東西方貿易的重要地理位置，卻又難掩自身派駐此異地的孤寂落寞感。

息力開新島，帆檣集四方。左襟中國海，西接九州鄉。

野竹冬仍翠，幽花夜更香。誰憐雲水裡，孤鶴一身藏。（〈息力〉，頁 86）

尤其到了第二次駐新，清廷危機更重，領事的無力感可想而知，甚至有詩自嘲自己面對華人受侮時的態度：「世無公理有強權，舌敝張蘇總枉然。外侮頻來緣國弱，中興再造望臣賢」（〈華僑有以受侮投訴者作此示之〉，頁 176）。箇中無奈，不言而喻。使節終究是過客，「經過冷署頻回首，蝶去樓空樹半傾」（〈舟過息力〉，頁 168），息力在這裡的韻味，特別彰顯出潛在的歷史變局。

黃遵憲的《人境廬詩草》（1911）收錄有關南洋的漢詩三十餘首，這些片段的南洋形象紀錄，卻頗具盛名。〈以蓮菊桃雜供一瓶作歌〉處理離散華人在殖民地的族群政治，觸及整體的華人歷史處境。〈新加坡雜事詩〉是一組典型的南洋風土書寫。其中名作〈番客篇〉歷來被視為重現華人大流徙時代的移民「詩史」，強調其以民歌形式表現十九世紀末海外華人生活的歷史情境。

〈番客篇〉細寫南洋土生華人的婚禮過程和各族賓客匯聚的場面，儼然描述南洋地誌。從婚宴的布置、飲食、擺設、服飾等生活日

洲」之名已見於左秉隆在一八八七年〈遊廖埠〉詩句。陳的說法見氏著，〈一八一九年以前的新加坡〉，《椰陰館文存》（第一卷）（新加坡：南洋學會，1983年），頁 64。

常細節展開敘事，以豐富多變的詩語言，表徵了南洋詩獨具特色的民間格局。詩人著眼中西元素並存、華洋雜處、族群互動，以寫實的華人婚禮，描述華人移居離散的環境。透過賓客不同的行業，從漁業、海運、礦業、種植業、貨殖、甲必丹等等發跡的華人，詩人筆觸靈巧，寫盡暴發戶、投機者、資本家的不同嘴臉，已是華人拓荒史的縮影。

處於帝國使節與殖民地華人的保護者的角色之間，黃遵憲筆下的「番客」更進一步道盡「番」民身份與「客」居的現實。他不但直指清廷政府海禁政策的錯誤，以及衍生的鄉人對歸僑的剝削和掠奪：「國初海禁嚴，立意比驅鱷」、「誰肯跨海歸，走就烹人鑊」、「堂堂天朝語，祇以供戲謔」，並同情華人異地生活的無根和邊緣處境：「譬彼猶太人，無國足安托」、「雖則有室家，一家付飄泊」。尤其生存在西方勢力底下的殖民地，勞動移民群體的文盲者，其終究無法表述自身的生存體驗：「一丁亦不識，況復操筆削」。而識字者，也在難以歸返祖國和西方權力階級的排擠之外：「識字亦安用？蕃漢兩棄卻」。這深刻透露出「番」在國境內外脈絡下被拋置的流離現實，「客」更非一般流寓者的「客感」、「客恨」，而是移民群體無法言及的飄零。

〈番客篇〉呈現了我們當今談離散華人（Chinese Diaspora）的原初場景。因此「近來出洋眾，更如水赴壑。南洋數十島，到處便插腳。他人殖民地，日見版圖廓。華民三百萬，反為叢驅雀」直指使節眼下「被發現的南洋華人」，是如此一幅景觀：遭漠視的移民勞動群體，華人教育的匱乏、無力護僑的中國政府、壯大的西方殖民勢力和優越的白人統治階級。換言之，作為使節與詩人的黃遵憲，在晚

清時刻發現了一部「華人移民史」。這些境外漢詩勾勒了人類學和社會學意義下文化遷徙，可以看作華語語系文學的最初概念與雛形，跨境離散的南方敘事。

三、孔教與漢詩的流亡

一九〇〇年兩位晚清嶺南的著名詩家康有為與丘逢甲南來，替南洋漢詩形塑了迥異的風貌。丘逢甲（1864-1912）是從台灣內渡廣東的抗日詩人，康有為（1858-1927）是戊戌政變後流亡海外的補臣，兩位名人為孤懸海外的新加坡島，帶來了巨大的文化光環及文教氣息。丘逢甲在抵達新加坡以前，他的百餘首詩作和文章經由當地文人邱菽園在報刊的登載與傳播，丘逢甲的名氣、光環與辦學志向早已滲入當地知識階層的紳商之間。此次南來還前往馬來半島，印尼各地演講與拜訪。整趟旅程由此定調為一趟宣揚辦教育創學堂宗旨的文教行旅，發表多篇倡導創建孔廟學堂的文章⁷，鼓勵了當地的孔教運動。當地華人的熱烈響應和推崇，讓丘逢甲感到意氣風發的自豪。從兩首〈自題南洋行教圖〉的氣勢看來：

莽莽群山海氣青，華風遠被到南溟，
萬人圍坐齊傾耳，椰子林中說聖經。

⁷ 〈勸星洲閩粵鄉人合建孔子廟及大學堂啟〉，《天南新報》1900年3月27日、〈紀邱工部逢甲大霹靂埠衍說 四月初一日〉，《天南新報》1900年6月4日、〈吧羅創建孔廟學堂緣起〉，收入廣東丘逢甲研究會編，《丘逢甲集》（長沙：岳麓書社，2001年），頁823。

二千五百餘年後，浮海居然道可行。

獨倚斗南樓上望，春風迴處此瀾生。⁸

詩裡盡現熱烈的排場，展示一種文化自足。恰是這種萬人聽教的場景，激動詩人飄零枯竭的心境，彷彿找到了異域漢學復興的契機。丘逢甲終於在自我建構的漢詩與文教空間裡窺見理想，渡海實踐詩與文的寄託。從保教保種到興學，當地移民所追求文化身分的安頓與確立，振興丘逢甲的教育事業，也牽動了孔教播遷的文化地理。

同年，流亡中的康有為接受了邱菽園的邀請，從香港來到新加坡避難，開始他在新馬地區的流亡生活。作為戊戌政變的出亡者，他前後出入新馬的次數要比晚清其他流寓南洋的文人更多，留居時間相對也長⁹。他在南洋創作生產的漢詩，足以組成他已出版詩集的三卷。這階段的漢詩內涵，基本籠罩著一種深沈的創傷意識與帝國想像。戊戌變法時他走在帝國前端，變法失敗後他走在帝國境外，他自詡為帝國維新之師，卻又只能在絕域流離喟嘆。他驚恐無奈與忐忑不安的壯志抱負，在詩裡化成一股鬱結的氣象：

⁸ 丘逢甲，〈自題南洋行教圖〉，初見《天南新報》1900年5月22日。又見上注前揭書，頁470。

⁹ 根據最新研究成果考證，康有為前後進出新馬地區的次數高達七次。主要停留據點是新加坡和檳榔嶼。他分別在一九〇〇、一九〇三、一九〇四、一九〇八、一九〇九、一九一〇、一九一一年多次停留，時間長短不一，停留時間最久的長達一年半以上。詳張克宏製作的年表，氏著《亡命天南的歲月：康有為在新馬》，（吉隆坡：華社研究中心，2006年），頁101。

天荒地老哀龍戰，去國離家又歲終。
起視北辰星暗暗，徒圖南溟夜濛濛。
亂雲遙接中原氣，黑浪驚回大海風。
腸斷胡琴歌變徵，怒濤竟夕打艤艫。¹⁰

他將流亡狀態以詩賦形，同時「記史」。從宮廷鬥爭聯想海天塌陷，海路所見都是聳動意象——天荒地老、星暗暗、夜濛濛、亂雲、黑浪，排山倒海的壓迫感，早已置個人於流亡的大潮。詩的氣勢磅礴，筆力驚人，鋪張典故寄寓複雜的中原想像。儘管去國離家久遠，帝國的流亡者並沒有偏離核心，「北辰星暗暗」和「南溟夜濛濛」清楚對照君臣之間的距離和處境。他的君國情感，塑造了獨特的流亡文化地理。

康有為流亡新馬寫作的漢詩，基本環繞在聖君與帝國之中。當清廷再次傳來「偽嗣之變」，令他心焦如焚，憂憤難耐。他的詩已是為「史」而抒情言志，詩題直言「君國身世，憂心慘慘，百感交集」。一個帝國的通緝犯，亡命之際竟百轉千迴的顧念聖上與國體，他的流亡已不純粹銘刻個體亂離，而投向集體的中國災難。

當他避居馬來半島的森美蘭和馬六甲兩州邊境的丹將敦島（Tanjung Tuan），在海邊拾木之際，依然展示了驚人的巨大歷史志向。

¹⁰ 〈己亥十二月廿七日，偕梁鐵君、同富侄、湯覺頓赴星坡，漁舟除夕，聽西女鼓琴。時有偽嗣之變，震蕩余懷，君國身世，憂心慘慘，百感咸集〉，收入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文獻研究部編，《萬木草堂詩集》（上海：上海人民，1996年），頁112。相關詩作的引文均出自此版本。

斷木輪囷棄海濱，波濤飄泊更嶙峋。

他時或作木居士，後萬千年尚有神。(〈丹將敦島拾古木甚嶙峋，題詩其上〉，頁 121)

他從棄置的古木想像有朝一日可以刻成木頭偶像，在千萬年後供人膜拜的神靈。這當中曝顯了他對功業與自我學說的不朽追求，甚至隱含一種宗教性質的「教主」渴望。他十九歲鄉試落第，拜服孔聖，發憤讀書之際，早有「以聖賢為必可期」¹¹的抱負。民國以後宣揚「尊孔」為立國精神，更直言「吾少嘗欲自為教主矣」¹²，強調要在孔子之外自為教主的原始慾望，因無法攻破其學問轉而尊孔。亡命之時，他的「教主」情懷，隱然牽動了他在南洋宣揚和發起的孔教運動。

在此期間，康有為作為中國孔教運動創始者的光環，自然對南洋的華人興學產生巨大效應。他在各地宣揚中華文化，鼓勵華僑興學，卻成功推動新馬和印尼新式華人教育的誕生。這是南來知識份子浪漫的詩學想像，也含有傳播孔教的使命與熱情。他們作為華人文化教育的精神指導，建設了南洋早期華教的格局和規模。可以確

¹¹ 康有為雖皈依孔子學問，但躋身聖賢，成一家之言的雄心壯志已見：「於時捧手受教，乃如旅人之得宿，盲者之睹明，乃洗心絕欲，一意皈依，以聖賢為必可期，以群書為三十歲前必可盡讀，以一身為必能有立，以天下為必可為。」康有為，《我史》（南京：江蘇人民，1999年），頁6。

¹² 見〈參政院提議立國之精神議書後〉，收入康有為，《康有為全集》，第10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頁206。

認的是，康有為親身參與了新加坡華人女子學校和馬來亞尊孔中學的設立，如同他在詩裡的激昂表述：「與君北灑堯台涕，剩我南題孔廟碑」¹³。因為戊戌出亡，讓他有了在南洋的建樹文教的機會。箇中悲涼的情調，藏有流亡心思，卻精確描述了華僑社會文化教育的現實。

另外，康有為有詩：

華夏文明剩竹枝，南洋風物被聲詩。
蠻花駝鳥多佳處，恨少通才作總持。
中原大雅銷亡盡，流入天南得正聲。
試問詩騷選何作，屈原家父最芳馨。（節引〈題菽園孝廉《選詩圖》〉，頁 117）

他以南洋異域地景為竹枝詞的最佳素材，其實暗示了帝國崩毀，文化塌陷之際，詩的禮崩樂壞就是大雅銷亡。詩的正聲不在雅樂，而是國風的民間魅力。跨出境外的詩人，因此放逐天南，以民間歌謠形式重建詩的質感與動力。在他看來，屈原的放逐詩學，為流寓者漢詩寫作的整體精神貼上了標籤。康有為由「王者師」變成亡命逋臣，絕域反而形成詩的生產條件，他的感觸尤其深刻。因此他遊歷爪哇，就忍不住高歌：「中華士夫誰到此，我是開宗第一章」（〈遊

¹³ 這首詩有康有為的小注：「君與仙根再三創孔廟學堂於南中，後余貽書陸祐卒成之，今為尊孔學堂」。這也是目前矗立吉隆坡的獨立中學「尊孔中學」的前身。該詩題為〈庚子正月二日避地星坡，菽園為東道主。二月廿六遷出他宅，於架上乃讀菽園所著贅談，全錄余《公車上書》，而加跋語，過承存嘆，滄桑易感，亡人多傷，得三絕句，示菽園並邱仙根〉其三，頁 115-116。

爪哇雜咏》)。他有「史上第一人」的新奇與使命，顯然已自覺的意識到流亡背後具體的現代地理經驗，已非傳統的流放與避地可以比擬。

四、南洋風土：疆域、自然與地方感

一九〇七年常熟詩人楊雲史（1875-1941）出任新加坡領事館書記兼翻譯官，前後四年餘，寫作的詩詞近二百首，著有《江山萬里樓詩詞鈔》（1926）。他取南溟為主題，以紀史姿態表現南洋華人移民和拓荒事蹟，尤其深入觀察和議論中國與西方殖民勢力在南洋地域的消長，開啟南洋漢詩的外交視域和地緣政治的書寫。其中〈哀南溟〉成詩於辛亥交替，有其政治現實脈絡。端看詩題，已清楚標榜詩人旨在建構自己的南溟視域，非一般客愁。尤其長序為我們鋪陳南海移動路徑的移民史脈絡，強調對南洋的哀嘆，是中華帝國錯失對南洋佈局的先機。

初不知樓船橫海，宰割鯨鯢，四百年中執南荒牛耳者，大有偉人在，徒以海禁未開，有司目為海盜，不以上聞，謂珠崖為可棄，等夜郎於化外，聽其自興自滅。至今日而臥榻之側，龍盤虎踞，時機之失，可勝追哉？（頁67）

序裡不忘羅列華人移民在各地的豐功偉業，甚至哀嘆無人傳頌、史籍不載的窘況。

我人之割據稱雄，我海外霸權者，已非一人一日。其人類皆豪傑，不得志於中國，乃亡命入海，卒能驅策異族，南面稱孤，不亦壯哉？獨其振臂孤往，無所憑藉，但奮其筋骨血汗，

縱橫於大海之中，不知其幾費經營，成厥偉業，至今日而無人能言之矣。良可慨夫！（頁 68）

從今天的眼光來看，詩序的史觀既保守，又微妙。而詩句的回應，以紀史兼抒情的風格，進一步點評出南溟風土的內景，鋪陳華人稱王、征服、拓荒的歷史，帶有幾分豪情壯志的重建南洋史觀：

其間稱王十餘傳，或數十年或百年。一二故事但口述，考之文字殊茫然。當時百蠻皆懾服，或以兵力或以賢。洪氏葉氏為最盛，洪武以後嘉道前。其人類皆雄俊悲不遇，掉頭入海不回顧。……伏波銅鼓征南服，渡瀘深入文身俗。但聞地角有干戈，不知天上何年月？南荒阡陌起人煙，斬棘披荊不計年。大澤雲深驅象陣，春山日暖種桑田。（頁 69）

全詩透露出帝國末代外交官吏的憂患，他藉由中國跟南洋交流往返的歷史，重估詩對「疆域」的思辨和回應。儘管楊雲史竭力以序、詩拉開帝國中心的南洋視景，但箇中無以迴避的「危機」和「鄉愁」，說明朝貢體系的瓦解，失去了界定夷夏秩序與疆域的立足點。他大肆著墨南洋華人殖民史，張揚民族主義立場，不也同時凸顯「中國」遭遇世界，必然要調整與周邊國家的關係策略。因而中國在南洋各地添設領事館，為詩人的南溟視域下了最好的註解。

與此同時，楊雲史卻有大量以唐詩意境突顯南洋自然「景觀」（landscape）的詩篇，以雅趣、閒情、幽興經營斷片、碎片狀的南溟地方感，清麗詩語砌成的自然細節，撞擊和稀釋了〈哀南溟〉的焦慮。這可視為另一種的詩學「轉譯」策略，替楊雲史處身南洋的「感覺結構」，補上疆域與自然的辯證。其中〈西溪行〉，仿照王維〈桃源

行〉寫作，以「桃花源」意象寫作自己遊歷馬來半島柔佛州深山大澤，巧遇華人農民的經驗。

……爭問中原今何世，乍聞戰伐共長嗟。此間歲月前朝歷，不知治亂幾更易。自言避世隔人寰，海上田園無消息。相逢世外兩無心，何如從此宿雲林？……先人世世為農父，山中子孫今無數。外邊呼作武陵溪，居人不識桃源路。送客含情問後期，重來莫自迷津渡。平明日出照山村，開門滿地榕花雨。(頁 54-55)

楊雲史對華人遷徙南來生發的浪漫想像，顯然是一幅寓言式的自然景觀。詩裡勾勒的避禍移居、扎根落戶、世代繁衍，句句緊扣離散華人世襲的生活狀態。但「迷津渡」和「榕花雨」以桃花源意境收束，則是回到傳統主導性的美學化風土。當離散華人縮影為山林農父，詩人成了探幽窺奇的武陵人，迷離虛幻的詩學操作，將華人移民社會昇華為審美對象，抽空了〈哀南溟〉裡「數著殘棋猶未了，風生日落更無人」的落寞神傷。換言之，桃源的舊詩學系統試著重新界定南溟疆域下的移民群體，風土在一套詩語言的適應和馴化過程，確立了「居人不識桃源路」，蒼然世外，悠然相忘的自然風景。

相對短期過境或流寓的文人，以「星洲寓公」自詡而終老於新加坡的邱菽園(1874-1941)，一生為馬華文學留下一千餘首詩作。他有「南僑詩宗」之譽¹⁴，也是康有為、丘逢甲眼中最具才華的南來

¹⁴ 程光裕，〈南僑詩宗邱菽園〉，《星馬華僑中之傑出人物》(台北：華岡出版有限公司，1977年)，頁 89-123。

詩人，前後出版了兩部詩集《嘯虹生詩鈔》（1922）、《邱菽園居士詩集》（1949）。一八九六年二十三歲的邱菽園移居星洲繼承父親龐大遺產，投入當地文教建設和鼓吹風雅。他創辦麗澤社，提供和鼓勵了當地文士才人進行文藝創作和投稿的機會，開啟他在當地的影響力。當時麗澤社在報刊公開徵稿的星洲雜詠詩題，就有「星洲竹枝詞」、「粵謳題」¹⁵。在星洲雜錄部分，不限散文駢體詩詞，題目都跟當地生活場景相關如「打球場、旌旗山、博物院、自來水匯、公家花園」¹⁶等。以民間歌謠和竹枝詞形式，擷取當地題材，邱在南來初期已建立自己的在地視域和眼光。值得注意的是，他以馬來語和英語入詩寫作的「星洲竹枝詞」，不是實踐詩界革命強調的「新語言」，而是南來文人以舊詩形式貼近當地語言的文學戲仿，透過詩語的轉換和轉譯，遊走文／體的疆界，形塑竹枝詞的在地趣味與地方感。

馬千馬莫聚餐豪，馬里馬寅任樂陶。

幸勿酒狂喧馬己，何妨三馬吃同槽。

（馬千：makan 吃；馬莫；mabok 醉酒；馬里：mari 來；馬寅：main 遊戲；馬己：maki 辱罵；三馬：sama 一起）¹⁷

此外，他創辦《天南新報》（1898-1905）、承頂《振南日報》（後易名《振南報》）（1913-1920）參與中國境內的政治議題，接濟政治流亡者康有為、容闈、梁啟超等，資助庚子勤王。同時聯繫當地土生華

¹⁵ 〈麗澤社十二月課題〉，《星報》1898年1月5日。

¹⁶ 〈樂群文社冬季題目〉，《星報》1897年12月15日。

¹⁷ 李慶年編，《南洋竹枝詞匯編》（新加坡：今古書畫店，2012），頁180。

人開辦女子學堂，推動新馬地區的孔教運動。邱菽園以文人品味及文化資本積累而成的文學空間，最大的意義在於建構了一個中國、台灣、香港與南洋區域之間的漢詩人交遊的網絡。他透過宴飲酬唱、詩文互通的疊錯網絡，呈現文人在新舊交替的時代感受。尤其他意識到南洋乃絕域炎荒：「……不堪荒服外，猶自滯歸程。採訪存民俗，知交惜死生……」¹⁸。因此邱菽園主導的文學實踐，或建立的文學場，不應只視作個人事業。他收集和出版流寓文人作品，藉由公共資源，召喚和描繪一個離散的文學想像，為大時代中短暫易逝的流離感受，以及境外漢詩的生產環境，保留一個南方的文學譜系。

邱菽園詩集裡留有不少以「星洲」命名的詩篇。¹⁹他著眼南洋地域的生存感覺，寫作風月紀聞、異族婦女的習俗，帶有文人風流雅趣。除了寫作官能風土的遊戲之作，他也特別雜揉南遷歷史脈絡，為星洲找到自身的書寫位置，突顯出他不同於一般流寓者的眼光。然而更能具體展示漢詩的境外生成意識，還是詩人投入書寫亂離體驗與異地生存的種種文化衝擊和在地生活的關懷。邱菽園曾以清麗淡雅筆觸描寫移居者落地生根的現實情境，無形之中延續了黃遵憲早期「遷流或百年」（〈新嘉坡雜詩十二首〉）的觀察，並進一步從自己的華商身份出發，體驗他鄉遇故知的共鳴。這不但豐富了離散漢詩的鄉土感覺，也拓展流寓者漢詩創作的的基本關懷。

¹⁸ 丘菽園〈寄酬邱仙根四首〉，收入邱焯菱（菽園），《菽園詩集》（台北：文海出版社，1977年），頁51-52。

¹⁹ 這樣的詩篇不少，如〈新嘉坡地圖〉、〈星洲〉、〈星洲紀遇〉、〈星洲謠〉、〈星島〉、〈星洲晚眺〉等。

舊雨椰風外，連岡橡葉青。
相逢盡華商，移植到南溟。
鄉土音無改，人間世幾經。
安閒牛背笛，吹出自家聽。(〈移植〉²⁰)

造林增野闢，築壩利車行。
榛莽卅年易，芳菲百里平。
山低無颶患，舟集有潮生。
烽火驚鄉夢，僑民漸學耕。(〈島上感事四首〉之一)²¹)

透過邱菽園深入觀察南洋地理的人文風貌變遷，漢詩呈現出南洋從炎荒之地，變為建設有成的移民社會。只是末聯一句「烽火驚鄉夢」，讓讀者看到詩人隱藏的情緒張力。移民城市景觀的變化，對照原鄉喪亂動盪。移居者所把握在地感，凸顯在現實的「僑民漸學耕」。他們成了回不了故鄉的廣義遺民，只好在異地重建自身的文化教養。對照前一首的詩題〈移植〉，人的遷徙其實是根的移植。詩的言外之意似在強調：他鄉重逢不是偶然，而是新生活的開始。邱菽園的觀察顯然透徹，這些張揚南洋地方意義和特質的漢詩面目，已非一般流寓者的獵奇目光。所謂詩的地方色彩，在邱菽園身上已深化為在地生活感。

本文檢視十九末至廿世紀初期的馬華離散詩學，透過重要個案的簡要描述，勾勒出新馬漢詩發展的基本譜系，並試圖從南來與南

²⁰ 〈移植〉，收入邱煒菱（菽園），《菽園詩集》，頁 428-429。

²¹ 〈島上感事四首〉第一首，收入邱煒菱（菽園），《菽園詩集》，頁 424。

遷的歷史情境，解析南來在漢文學播遷的視域內，凸顯的文化想像和文學地理，並重新思考馬華文學史置於於離散詩學的可能意義，藉此凸顯馬華古典文學在東亞漢詩與漢文學系統內的重要位置。我們透過探究南來漢詩的生產，見證了馬華文學史流動的可能，並為馬華本土性的探勘提供一個歷史縱深的參照。而十九世紀末為起點的馬華離散詩學，理應是我們重新認識馬華文學史的重要開始。

† 本文原收入高嘉謙、鄭毓瑜主編《從摩羅到諾貝爾：文學·經典·現代意識》（台北，麥田出版公司，2014），頁 318-337。